



# 钻头大王倪志福难得说出的故事

二十年前，北京市委宣传部曾组织编写一套系列丛书，选择以李瑞环、倪志福、时传祥、张秉贵等为代表的各条战线上的杰出人物作为采访对象，以展示他们的精神风貌……我应邀成了这套系列丛书的作者之一，分给我的任务是采写倪志福。

1996年1月8日上午，我如约来到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位于全国总工会大楼的办公室。

落座后，我递上了一份采访提纲。倪志福接过来翻看了一下说：“这里面的东西太陈旧了，我给你讲点从未报道过的事情吧！”

## 用土法造出了东方红5号火箭

现在好多人都知道我出名是制造钻头出名，对的，这是一个方面。但不知道送卫星上天的东方红5号火箭，也是我组织人搞出来的。周总理真正认识我，也是因为我搞出了火箭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两派群众打派仗，不干活了，送卫星上天的火箭没有人搞。周总理冒火了，很着急，就把这项任务交给上海和北京，由工人来干。

那时我已是中央委员，九大当选的。我们接受了任务。实际上光工人干不了，我搞了“三结合”的班子。我点将点了一批技术人员、一批车工、一批铣工、一批钳工，这些都是拔尖的人。

火箭的前面是由钱学森先生设计的，我们负责后面。加工的难度非常大，全是斜孔，人家都用精密仪器干，我们是土办法上马干出来的。人家有机床保证精度，我们是模具保证精度。

1970年5月份交给的任务，要求半年完成任务，我们9月份就交货了，提前了两个月。后来，七机部管事的人都到我们618厂来开现场会。五机部的两位部长也来视察说：“七机部很满意！你们现在还叫倪志福同志劳动改造？你们不用的话，这个人我们要用。现在你们这个厂子乱七八糟，把干部都打倒了，叫倪志福牵头，领导这个厂搞生产。”

## 实现年产装甲车从87辆到1000辆的跨越

接手厂子时，我还是副总工程师，总工程师被打倒了。10月份任命我为总工程师，我们这个厂是生产装甲车的。

1970年11月份开始改造老厂的时候，我说：第一，我一人是搞不了的；第二，制度要恢复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把这些全都破坏了，现在画图的、描图的、设计的、审核的没有签名，最后签名的都是设计组、描图组、组组长，完了到我总工程师这里，将来时间长了我都忘了。你设计的，我总工程师只能原则上审查，审查总图。零件图我是不管的，总工程师不能管零件图呀！我说，这两条你们答应的话，

我可以干；要不答应，我这个代总工程师的差事就没法干了。

五机部领导说，同意你这两条意见，你这两条意见是合理的。

我所在的618厂是个老厂，原来从修理到试制小批量生产，最高一年只能生产87辆装甲车，这怎么行？老厂要改造，一年应该搞到1000辆，打仗的时候搞到2000辆。我把这个生产方案拿出来，向部里报。部里同意这个生产方案，1000辆车，投资2000万元，把厂房搞起来。

从1970年到1973年，我穿着破棉袄与群众滚在一起，发动群众，号召群众，一心搞老厂改造。那时没有奖金，我们大干三年厂子大变样，一共花了2000万元，生产能力上去了，由过去的年产87辆到现在的年产1000辆。

## 周总理教我怎样当领导

1973年，我第一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散会以后，周总理把我留下，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。那时陈永贵还没有上来，吴桂贤也没有上来。

总理说，解放前你是当过童工，解放后，你又上过大学，又经过“文化大革命”这种锻炼，我相信你们这代工人出身的干部，能够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去做。讲得很细。

总理又对我讲，你现在到了最高的政治领导岗位，自己要注意几个问题。比如说，你刚上来，还不了解最上层的政治生活，不要自作主张，签字、批准什么东西，讲话呀要小心。因为你现在身份已经变了，你不是普通的工人了，你也不是北京市一个副书记了（那时叫书记），你现在是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候补委员，因此你的讲话今后要注意呀，一切讲话以前不算数现在都要算数呀，你要向吴德同志学习。

总理说，这个同志比较老练，稳当，比较谨慎，有领导经验，你有什么事不清楚的请教吴德同志。你先跟他学习一段，协助吴德同志把北京工作搞好，中央的事以后再考虑。

周总理就是这样跟我谈了一番话。我印象很深。为什么总理去世后，我要跟吴德同志两个人去医院呢，就是想着总理生前的交代。那天我们进了医院，正巧邓小平同志、汪东兴同志

也到医院来了，我们四个人向总理遗体告别。记录当时的电视片、电影片都有。中间是邓小平、汪东兴，一边是吴德，一边是我。后来“批邓”了，把邓小平的像剪掉，中间空了一个人。

## 成立技术交流协会，带队攻关

我是1960年当的工人工程师。我感觉自己在钻头技术理论上，当工程师的水平是不够的。当时我们厂里办了一个大专班，厂里培养我上了大专班，三年脱产。上了两年基础课，我就得肺结核了。我休息了几个月，吃药打针，把病控制住了，又上学。

这段时间，我不但在厂里读书，每个星期六还要出来到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，参加技术交流站活动。这个自发的活动从五十年代中期就开始搞了，哪个厂子有难题了，我们就去会诊，帮助解决。六十年代初，技术协作活动搞得热气腾腾。

当时苏联专家撤走，好多工厂企业的技术难关攻不了，工人们挺身而出，专门解决技术难关。沈阳市的工人们最早搞了技术协作活动，彭真同志去看了，称赞说是共产主义协作精神，他让北京市生产委员会把我们叫出来牵头，也搞北京市技术协作活动。无记名投票，一共选出9人组成，我被选为主任，参加活动的都是劳模。

“文革”开始后，我领导的北京市技术协作活动也瘫痪了。后来，市工交政治部一个姓林的管我们厂，给厂里来了个命令，把倪志福请出来，于是厂里又把我送出来。正好那一天，“红色技协”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会批斗韩伯平和其他领导干部，要我们去揭发他们。我说，我们揭发什么？“红色技协”两派，一派要主持这次批斗会，另一派也要主持这次批斗会。正当他们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我和李长安溜走了。

1972年，吴德同志觉得北京市总工会不行，闹派性。我当时已是市委常委，要我来组织整顿。吴德说，还是你来当筹备小组组长。

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，我提了一个九人的工会领导名单，经吴德同志批准后，召开了工会代表大会，选我当主席，李瑞环同志为副主席，我

们又重新搞起了技术协作活动。

## 想一步登天，是登不上去的

我在工厂时写过几本书，《倪志福钻头》是其中的一本，书出来后影响很大。美国有个叫吴献民的教授，是台湾人，他搞金属切削的，拿到了我们这本书，研究这个钻头，在美国的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章，赚了不少的钱。他的行为侵犯了我们的知识产权，但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专利这一说。

据说美国每年给吴献民20万美元，叫他研究制造这个钻头，提供给美国公司用。这个人在我们国家招了研究生，到他那里去进修，回来的同学说，我们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啊。美国搞这方面研究，相当的火热，在国内听都听不到。有的人找我来，我说，这个项目应该再搞起来，因为我现在做领导干部了，没有精力去抓这个事了。北京理工大学、湖南大学的一些教授，还有北航、北大的都有人在研究这个钻头。他们用机器不用手磨。

我想，这个东西真要下点功夫的话，中国的钻头一年可生产1.6亿只，其中七八千万只是出口的，我们自己用七八千万只。假如说，都用了我们搞的那种钻头，一年要节省多少钢材，一年要提高多少效率，那是没法计算的。

我跟钱学森说，火箭上天，有的上天，有的掉下来了，什么原因？原因是工艺和材料，零部件与原材料未过关。都是一张图纸设计的，为什么有的打上去，有的打不上去？火箭是这个样子，包括燃烧都是这个样子，都是原料跟燃料问题。

我在天津做过调查研究，感觉我们现在最落后的是不注意从基础抓起，一步想登天。实际上是登不上去的，到了一定时候要掉下来的。像造房子一样，把基础打好了，这个高楼大厦才能造起来，几十年几百年不会变形。搞工艺也是这个样子。

现在我们有些短期行为，短、平、快，有时需要。但有钱了，要想到马上把基础打好。我们不是这样，“数字出官，官出数字”，表面文章，看你成绩大马上升官，这种办法是不行的，这不是科学的态度。

摘自《北京青年报》